



在卓越中演进民主

——对古代雅典民主的一种价值论思考(上)

何怀宏

摘要:在卓越中演进民主,是古代雅典民主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近200年的历史演进中,追求卓越的政治精英与追求平等的民众共同推动了雅典民主的发展,但与其说雅典民主是主观推动的结果,毋宁说它是历史自然演进的产物,没有任何理论蓝图的先导,只是智慧的雅典人在特定的时空排除了贵族政制与僭主政治、因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而已。当然,卓越与民主既可以互相促进,同时也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在漫长的雅典民主实践中,卓越与民主能够协调发展,希腊民族性格中的中道精神、尊重法律以及重德性、轻物质的幸福观,也功不可没。

关键词:希腊城邦;雅典民主;价值;卓越;平等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5-0005-12

一、引言

英国古典学者基托曾经谈到,古代雅典所取得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是“奇迹”,但又是“自然的”^①,本文试图探讨这两种“奇迹”的一些“自然之理”。我试图主要在价值论的层面上来思考雅典的民主,即考虑在这方面推动民主的主要价值动力是什么,民主又促成或保持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文化。雅典演进民主的过程是一种历经近200年的比较坚实的缓进,避免了大而持久的流血动荡,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却又能把民主发展到一种非常彻底的乃至今天范围广大得多的现代民主也无法企及的程度^②。在雅典,最高的权力最后非常平等地为所有公民执掌,不仅是“多数裁决”,更有“轮番为治”。那么,这种彻底的民主是何以产生和演进的?而志在卓越、本身能力和影响也足够卓越的少数政治家与民众

① 基托.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6-117.

② 现代人谈到雅典的民主,总是很快会遇到“这一民主并不包括雅典的所有成年居民,而只限于公民团体”的难题和挑战。雅典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的确不属于这个公民团体。我们在此只能大概地说:当时的男女有别、女性不参政和一定范围内的蓄奴制是当时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内外有别在今天的世界上也仍旧普遍地存在,乃至在以民族国家为主的世界体系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公民团体内不分贫富和贵贱都享有平等的参政权——亦即民主——则是当时希腊许多城邦,尤其雅典的特有现象。雅典的奴隶大都是战俘,这相对于在更早的时代或者其他部落或专制国家在战争中动辄杀死战俘可能还是一个进步。尤其在梭伦以后,公民再贫穷也不可能沦为奴隶。充分认识到奴隶制度在道德上的不正当和不可接受以及所有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意义要到近代之后。而且,相对来说,雅典的妇女也可能还是得到比其他许多专制政权下的妇女更多的尊重和保护,雅典的外邦人也大致享有与公民一样的言论自由,他们需要纳税,不能购置地产,但其财产权利还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没有政治的权利,但也减除了政治和军事的义务,不排除有一些人甚至会更愿意选择这种生活。在雅典的经济事务尤其是公共工程中,也大致做到了公民、外邦人甚至奴隶的同工同酬。作为矿山劳工的奴隶生活处境悲惨,但一般来说,奴隶在雅典的生活状况还是比在专制国家甚至希腊一些其他城邦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奴隶制是否构成雅典城邦的主要经济来源或基础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雅典公民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远没有现代人这样强烈,他们更重视政治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而能够过一种比较简单的物质生活,包括富人也更愿意仗义疏财或以钱博名。类似于“银行家和警务人员”这两个令现代人常常艳羡的职业,常常是由奴隶充任。在雅典的街上,从穿着上几乎看不出奴隶和公民的分别,许多奴隶还有自己的家庭和产业,甚至有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参见:汉森.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7,162-167,453-455.

在这一民主演进过程中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①? 雅典民主为什么在其上升过程和巅峰状态中都是一些家世优越乃至累世显赫的贵族成为民主的领袖^②? 少数个人对政治上的优越或卓越的价值追求,与公民群体对政治上的近乎绝对平等的价值诉求两者之间为什么竟然能够长期相当好地共存甚至协调? 这些就是本文想探讨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这里使用的“卓越”也基本上是在基托的意义上使用的,或者说更加扩展。基托说:

希腊人不会认为自己仅是处于某种固定环境中的存在物,而是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设想自己作为人的种种可能性。……他们称他们的理想为“阿瑞忒”(arete),……我们将它翻译为“德性”(virtue),结果是令其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至少在现代英语中,“德性”完全是一个道德方面的词汇;而与之相反,“阿瑞忒”这个词被普遍地运用于所有领域中,其含义简单说来就是“卓越”(excellence)。它的用法可以由其所处的特定上下文得以限定。如一匹赛马的“阿瑞忒”在于它的速度,一匹拉车的马的“阿瑞忒”在于其力量。如果这个词用在人身上,在一般的语境中,它意味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个方面。^③

也就是说,这种“卓越”虽然包括道德的德性,但又绝不仅仅是道德的德性。它是要使“人之为人”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使人达到尽可能的高度。它并不完全就是一个褒义词,尤其在政治上。这里“卓越”的含义可能包括有:地位和能力本身的优越;作为一个价值目标的追求卓越;最后也的确达到了某种“卓越”——即取得了对社会相当重大的影响,产生了重大的结果。但它其实不仅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也有可能产生坏的结果^④。

“卓越”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在追求和欣赏“卓越”的人们内心看来自然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但“卓越”的主客观因素在每个人那里的组合或者组合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人社会地位和财富更优越,有的人政治抱负更优越,还有的人则是两方面都强,或者本来有多方面的卓越,但政治企图心反而较弱,却被政治推到了首屈一指的位置,比如梭伦。

或许我们可以简要通俗地说,“卓越”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出众”,即突出于大众,做出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产生多数人作为个人产生不了的影响。从技艺或领域的角度来说,“卓越”也就是尽量做到各种技艺或领域内的“最佳”或“影响最大”,或者做到某个群体的“最好”,最为重要,最引人注目。在多数人中常常是安全的,但只有在少数人中,在极少数乃至最高一人中,才能引起最广泛的注意或者说获得最高的“荣誉”或“声名”。

本文上篇也主要是谈政治上的卓越,而且是民主政治中的卓越。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上要做到“最好”“最成功”,往往就是要通过面向大众、吸引大众才能做到。这样,要突出于大众恰恰要通过融合于大众,服务于大众,哪怕这对有的个人只是表面的姿态。但对真正民主政治的精英而言,他们绝对不能够脱离大众,更不能敌对大众。脱离和敌对大众就是他们的失败甚至死亡。这样,民主制度下的卓越或可说就必须是“在众”,而卓越却意味着“出众”,这两者之间肯定会有有一种紧张,甚至很难兼容,但为什么雅典人却在民主政治和卓越个人两方面都创造出了“奇迹”?

① 过去许多古典学家和人文社科学者都比较强调或承认雅典民主的渐进及一些卓越人物在其中的作用,乃至认为这一点古代雅典民主与现代比较成功的民主相比是类似的。但也有些学者更为强调变革的根本性质以及民众或者暴力的革命性力量在这方面的作用。例如 Josiah Ober 认为,虽然他并不否认克里斯提尼的杰出乃至天才,但是,其制度改革的基础是建立在一场开始并没有他参与(他已被流放)的民众反对斯巴达人的暴力“革命”之上。他甚至因此提出“雅典革命”的概念。参见: OBER J.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Essay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2. 戴维斯也根据新的铭文史料,将公元前 460 年左右的一场由埃菲阿尔特发动的重要政治变革称之为“雅典革命”,只是认为“它是一次以非常保守的政治词汇来表达的革命”。见戴维斯.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黄洋,宋可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4.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7. 对“人民领袖”的系列追述,只是到伯里克利死后,才开始有如克里昂等非贵族的人成为平民领袖,但他们也是来自殷实之家。

③ 基托. 希腊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21-222.

④ 就像地米斯托克利老师评论自己热烈地渴望和追求卓越的学生所说:他将不是流芳百世,就是遗臭万年。当然,地米斯托克利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前者。但同样追求卓越,甚至性格都有些相同——比如同样机智、不惜改变、善于权谋而且家世更优越的亚西比德,虽然能力也足够卓越,他对雅典城邦及民主政制的重要影响却很可能是负面的超过正面的。当然,就本文主要是探讨雅典民主的演进而非衰落而言,我们将比较集中于描述卓越的正面结果。

二、希腊人的价值追求

雅典的民主与卓越的关系需要在整个希腊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追求中来考虑，亦即雅典这两方面的光荣不可能脱离整个希腊民族来阐述，不可能脱离其早期的历史来阐述。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雅典在希腊诸城邦中并不突出，但在其后的两三百年来，却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民主政治和卓越文化的“首都”和“学校”。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希腊文化为雅典注入了怎样的最初活力和价值源泉？

两千七八百年前，开始结成城邦的古希腊人接续的是一些“中断的文明”，所面对的是一个“纷纭的世界”。在那些土地上，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又湮没无闻，直到大约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才又重新根据腓尼基字母创建自己的文字和城市。但他们所面对的地中海世界，却确乎是近代以前最接近于是一个世界的“世界”。

希腊人主要接受两种精神文化的哺育，一种是希腊神话，一种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一系列史诗。两者的资料又常常糅合在一起。无论其中的是神，是人，或者半神半人，几乎都有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希腊神话中不仅有拥有各种各样才能和志趣的神，在半神半人和人类中也是如此，除了像战斗、计谋方面的英雄和出类拔萃者，还有像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德性的卓越者菲勒蒙和包喀斯等。布克哈特写道：在希腊神话中“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到很晚的时候还一直起作用的希腊人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一直做最好的，去超越他人。’”（《伊利亚特》卷六208）^①。

在那个战争比较常见的时代，最普遍的自然是与追求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勇敢的德性，而且不仅要勇敢，还要战胜。膂力过人、武艺超群的胜者得到更高的赞赏。还有一种主德则是正义，这里的正义主要是“报的正义”，报答朋友和报复仇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主要英雄阿基琉斯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无论是勇敢仗义、作战能力杰出的阿喀琉斯，还是除了勇敢也足智多谋的奥修斯，他们都展现出一种卓越，几乎所有的英雄也都在争取优秀和卓越。这些史诗和神话传说，通过游吟诗人在希腊广为传播，是希腊人的一个基本教育材料，甚至不识字的人也耳熟能详。亦如布克哈特所言，“很早以前在荷马史诗当中存在过一种优雅，以一种最高贵的美感为形式。希腊人确信，他们听过诗人的歌声的祖先们一定能够从道德上理解人类行为中那些最好的和最值得称道的东西。这自然会影响他们当中那些最优秀的人们；其他人则恪守着一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在城邦政体的影响下生活”^②。

在奥林匹亚等赛会兴起之后，还吸引了无数的希腊人同场竞技，争取桂冠。在注重“万物一体”和个人的统一性与完整性的希腊人那里，体育不仅是体育，更是整个人格和精神的体现。他们最在意的并不是不断刷新和打破纪录，而是展现人的全面优秀。所以，并没有专业的运动员，只有“业余的”或者说“爱美的”（amateur）参与者。的确，夺得桂冠者总是极少数，但即便大多数人实现不了卓越，也能欣赏和鼓励卓越，希腊人给予竞技的优胜者以极大的荣誉。战场上的勇者、胜利者当然更得到普遍的赞誉和立碑纪念。

不过我们要看到，追求卓越在古代社会并不是陌生的——相反，这种追求倒是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比较陌生或单一，我们在其他的古代文明如波斯、埃及文明中也看到一种普遍的对优越的追求。我们这里还想深究，古希腊人的卓越追求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希腊人追求卓越是多方面的，即实现各种人的、各种技艺的优秀和“德性”，而这些优秀和德性并不完全处在同一个等级，在希腊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还是有一种先后次序乃至高低不同的分类。布克哈特列举了多种古希腊人的价值追求，从比较一般的“幸福”“福分”，到比较具体的荣誉、声名、财富、权力、健康、俊美、友谊等等。但在他看来，“和其他的时代和其他的民族相比，希腊人的生活中把对荣誉的追求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天才的希腊人的目标，从荷马开始，荣誉或“对荣誉的热爱”（philotimia）就

^① 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02。

^② 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33。

是“永远处于第一位的和最耀眼的”^①。

在荷马史诗以及其他历史文献中我们经常看到,当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都要介绍说他是谁谁谁的儿子。他们都渴望光宗耀祖,不负父辈的光荣。希腊人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总是将荣誉放在第一位。在《奥德赛》中,涅斯托尔呼唤着雅典娜:“尊敬的女神主,请你广施恩惠,赐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及贤惠的妻子崇高的声誉。”^②

财富固然重要,但古希腊人并不想以之为最高目标,无止境地追求财富。“中等财富是最好的”是贤人们的一句著名箴言。如布克哈特所言,在梭伦的诗歌中,首要的是 Olbos(意思是“幸福”“福气”或“财富”),接着则是声名、朋友的爱和尊重。但财富在这幸福中的份量却越来越弱化了。“如果一个人发达了,在他的家里有万贯家财,但是却没有高贵的雄心壮志,那么我就不会称之为有福气的人,他只是一个生活舒适的守财奴罢了。”(欧里庇德斯《安提戈娜》,残篇,198 Nauck)^③

在希腊人那里,还有一种对平衡、匀称、节制和中道的重视。德尔斐神庙上的两条铭文,一条是“认识你自己”,另一条就是“不走极端”。“认识你自己”意味着认识自己的可能性和限度:要努力去争取实现自己的最好可能性,但还是要知道自己的限度。而“节制”被视作古希腊的四主德之一。希腊人强调中道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极端,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容易走极端,容易追求极致,所以才更需要考虑节制与平衡^④。希腊人的“中道”是一种“叩其两端而执中”的中道。

在希腊人那里,还有一种深沉的命运感。他们会希望规避不祥的命运,但不会像一个胆小鬼那样做。如果灾难真的发生了,他们也会坦然接受,不去怨天尤人,而是与自己必须承担的命运和解——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责任乃至使命。他们并不想要廉价的快乐和幸福,甚至还会感觉到,当神灵赐给他们运气和福分的时候,也常常会将祸患降临给他们。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基琉斯在史诗的一开头就表现出对阿伽门农的强烈愤怒,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对他拔刀相向。而阿基琉斯也意识到了如果自己全力投入战斗将带来丧失自己年青生命的命运,但他并不畏惧,而是宁愿轰轰烈烈而死,也不愿平平庸庸而生,忘我地投入了战斗。

追求一种自由,尤其是城邦公民的平等自由,是希腊人的另一个基本特性,甚至成为他们划分自己与蛮族的一个标志。基托谈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将人类区分为 Hellenes(希腊人)与 barbarians(蛮族)的时候指出,“蛮族”并没有现代意义上与“文明”相对的贬义,这不是个涉及厌恶或蔑视的问题,也不意味着非希腊人就没有取得辉煌的文明成就,而是在于“蛮族”认为希腊人是自由的,非希腊人则总带有某种被奴役的印记。“希腊人在灵魂深处觉得专断的政府对他是一个冒犯”^⑤,而追求自由也就意味着不将奴役他人的权力视作首要的追求,这一点和许多专制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强烈不满,但也丝毫没有想“彼可取而代之”夺取其统帅权力。阿基琉斯是为荣誉而战,为友谊而战,为报仇而战,却没有为自身获得最高权力而战。

这种自由强调个人与城邦的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希腊人是如此热爱他们城邦的独立和自由,不管这城邦多么的小,这从宁死不降的米洛斯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羡慕大邦的荣耀而珍视自己的小城。希腊的各个小城邦的人们的确都非常珍视他们的独立和自由,组成一个城邦联盟是可能的,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却是很难的。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改变城邦内部的政治体制,甚至连让城邦在联盟中称霸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这种政治独立和自由在邦国之间并不总是平等的,但在城邦内部却是平等的。在政治上,不平等也无以言自由,也可以说正是这一价值追求构成了发展民主的强大动机和必要条件。如 Raaflaub 与

① 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王大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4.

② 荷马. 奥德赛. 王淑允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48.

③ 转引自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王大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36.

④ 参见基托. 希腊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27. 布克哈特也写道:“对希腊人来说,中道是消极的一极,是马缰,而优秀品质(kalokagathia)是积极的一极,是马刺。”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王大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17.

⑤ 基托. 希腊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

Wallace 两位学者最近写道：“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早期政治与军事平等；公民们，特别是‘中间阶层公民’的个人独立与自治；希腊人对让自己受赞助的人、领主与滥用权力的贵族的支配的拒绝；个人意见与选择的公开与宽容；与一种强烈的平等主义的对共同体的承担相称的个人自由；所有这些要素都植根于希腊民主的根源处。它们都是发展为后来最终的民主的必要的、虽非充分的条件。”^①

这里尤其关键的是自由，它能够沟通公民平等与个人卓越这两种容易造成冲突的追求，这里自由主要是指普遍的政治自由，它给了所有公民以平等，也给了卓异者以机会。因为这种自由主要或首先是指政治领域内的自由，在这个领域内，自由和平等其实是一回事^②。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批评说，希腊城邦中不是也有僭主和寡头统治？但是，这种僭主显然没有东方君主那样的专制权力，他们更像是一个贵族或平民的领袖，而且后来也基本绝迹。寡头也是相对于彻底的民主制度而言，保留了元老的一部分权力。其实它们更像是一种混合政制，而且还是受法律的统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许诺着公民自由。以斯巴达为例，它的国王主要是作为战时的世袭军事指挥官起作用，甚至在征战时也还受到监察官的监督。斯巴达国王的政治权力甚至还有不如雅典可以涉政的常任“将军”之处，它的主要国家大事也还是要通过公民大会的辩论与多数来决定。

的确，在希腊人的价值观念中，没有给予怜悯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观念中有着比在其他古代民族中更多的悖论或矛盾：如对自己的高度责任感^③与对他人评价的高度关注（突出地表现为荣誉感），追求极致的精神与注意节制、平衡和中道的精神；在某一方向或领域中希望做到最好与对个人人格的全面性与统一性的渴望；昂扬的斗争意志与对命运的体认与和解。最重要的、也是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和对卓越的追求。它们是矛盾的，容易冲突的，但也提供了巨大的张力和深度，使他们的追求更加多面、丰富，并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来创造出“奇迹”。

三、雅典的民主历程

雅典从公元前 594 年梭伦改革为民主奠基，到公元前 508 年至公元前 507 年克里斯提尼民主成型，再到公元前 322 年被马其顿征服之后结束民主政制，大概经历了近百年的准备和演进，60 年的辉煌和百余年的余晖。

我们可以稍稍追溯一下雅典走向民主的信史之前的建国传说。据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首篇“忒修斯”，是他集结了阿提卡一带的居民，在卫城山上建立堡垒并给城市取名为“雅典”。虽然准确的年代或难以确定，也不一定都是忒修斯一人所为，但它还是反映了雅典建立为一个大城邦的起点。忒修斯走遍了各个部族和城镇，以安抚和说服的方式努力使大家团结起来成为单一城市的民族，当然，这里面也有他的权威和权势，但他许诺削减王者的权力，说自己以后的职责仅是战争的指挥官和法律的保护者，其余的事项由公众决定。忒修斯兴建了一个公有的市政厅和大会堂，规范了一个共同的节庆和祭祀的活动，他还邀请外乡人加入他的城邦，但将人们区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贵族、农民和工匠。“贵族居有的优势是地位，农民是利润，工匠是数量。”^④

虽然亚里士多德说忒修斯倾向于民治政府，但正式开启雅典民主之路的还是梭伦。公元前 594 年梭伦的改革，首先是要解决最迫切的贫富差距，尤其是负债的贫民变成奴隶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

① RAAFLAUB K, WALLACE R. “People’s Power” and Egalitarian Trends in Archaic Greece//RAAFLAUB K, OBER J, WALLACE R.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7: 46.

② 研究雅典民主的权威著作《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的作者汉森也指出了这一点：雅典人不太谈平等，更多地是说自由，但是，如果平等是按照政治权利或者说机会的平等的含义来理解，平等与自由的对立其实就不复存在。见汉森：《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与意识形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4-115。

③ 基托谈道：造就荷马式英雄的独特灵魂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而是对他自己的责任。他追求“卓越”，这种追求贯穿于希腊人的整个生活之中。雅典的辉煌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马，“是荷马教给人们以心灵的习性，这是一种在任何社会阶层的人身上都能发现的不可或缺的贵族气质，它要求将质置于量之上，高贵的斗争高于仅仅达到目的，荣誉先于财富。”基托：《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44。

④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1 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9：23-24。

还是政治问题。梭伦首先颁布了“解负令”,废除一切债务,解放一切因为债务而成为奴隶的人们,且规定以后不允许再因为经济债务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但梭伦做得比这还多,他考虑到长远的政治架构,并重新按照财富的等级规定了政治上的权力:所有公民——包括最低的日佣等级都获得了选举权,但只有比较富裕的三个等级——五百斗级、骑士级和双牛级——有担任官职的被选举权,最高的官职只能从最高的等级中选举。这的确还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比过去却是一大进步,原来主要是按照不可改变的家族血统来分配政治权力,现在却是按照可以改变的财产来分配政治权力了。这样不仅个人可以变动,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甚至某种“通货膨胀”,所有人都可以有机会进入政治上层。梭伦还创立了400人议事会,4个部落各派出100人。他还设立了民众法庭,认为行政官员判决不公的人有权向民众法庭上诉,每个公民也可以就公共事务向民众法庭提出控告。这些都是未来民主得以发展的基础要素。

但是,梭伦也拒绝了想重新分配财富和土地的要求。他说他力求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保持平衡、适度和中道。梭伦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他利用当时赋予自己的极大的优越地位和立法权力,制定了这些法律后不久就离开了雅典到国外游历。据说这是为了避开政争各派想要依靠梭伦以便朝着向他们各自有利的方向改变法律的要求,只因雅典有一条“只有立法者才能改变法律”的规定。当然,这其实是对法律的传统尊重所致,甚至此前严酷的“德拉古法典”也增强了这种法律的威严。总之,在梭伦离开之后,虽然还有党争,甚至有两年没有选出执政官,但基本上还是贯彻执行了梭伦的政策。

公元前561年,被称为“山地党”的一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在一场不乏阴谋、欺骗和强力的政变中战胜了他的竞争者,成了雅典事实上的僭主。他是以僭越的方式夺得政权的,但看来却并没有以僭越的方式进行统治。庇西特拉图仅仅是设法保证自己的支持者当选为执政官。他虽然也力图在各方之间协调,与其他贵族和解,但他的政策还是明显更倾向于普通民众。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比较温和宽厚,拨款借贷贫民,设立地方巡视法庭,包括他自己也经常下乡处理争端,所以颇得民心,虽两次被驱逐又两次都能回来。他和在他死后执政13年的儿子希庇亚斯基本上维护了梭伦的法律,保障了城邦的秩序和稳定。

公元前510年左右,僭主政治出现了危机,斯巴达派兵推翻了希庇亚斯,但接着又出现了党争,出身贵族世家的克里斯提尼选择依靠普通民众的力量取得胜利。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我们对克里斯提尼的个人情况了解不多,但他的家族一直是很有名望和权势的,乃至能和僭主分享权力。克里斯提尼的父亲曾经驱逐庇西特拉图,又曾经设计欢迎他回来,因为克里斯提尼的父亲还有其他的贵族政敌。克里斯提尼自己曾担任庇西特拉图死后的首任执政官,后来在推翻僭主之后,也是因为要和政敌竞争而转向诉诸人民的力量。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到公元前507年创立了一系列新法,以“demo”(村社)为基础,将原先的4个大部落打散重新划分为10个部落,每个部落都由互不相连的沿海、山地与平原三个区域组成。克里斯提尼又将400人议事会扩大为500人议事会,每个部落都抽签选出50人组成这一议事会。部落变小了,而且不容易集合起来,这样无疑可以防止任何一个部落坐大,加上制定了“陶片放逐法”,可以经过公民投票将最具有政治优势、也可能是最具有威胁性的一位政治家放逐10年。

这些均是可以防止僭主、防止单个或几个贵族联合攫取权力的措施。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意义深远,是从根本上倾覆了僭主或贵族统治的根基。后来战争危机时期的“四百僭主”、战败之后“三十僭主”的尝试即便有外力支持也很快失败,就说明了民主制度的稳固性。而这样的大改组竟然能够贯彻实行,可能还是与克里斯提尼的个人能力与家族势力有关。据说尽管克里斯提尼在划分区域的时候对自己的家族还是有照顾,但这一划分总的趋势是有利于民主的,甚至可以说是出于公心的。

地米斯托克利可能是平民领袖中家世相对寒微,不那么出名的,但他对政治与军事的权力、功业、荣誉的追求看来却是最强烈的。他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心和旨在最高权力和最大荣誉的抱负,非常专注于政治学业。第一次希腊波斯战争的雅典英雄米提阿德的战胜纪念碑“使地米斯托克利无法成眠”,但他也的确是富有政治的远见卓识的。他认为第二次希波战争势在难免,并

成功说服了雅典公民将银矿的收益不分配给众人，而是建造 100 艘战舰。如果不是有这些战舰，雅典人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无力与后来的波斯优势海军抗衡。地米斯托克利努力将雅典人民的注意力转向发展海军，认为未来胜负的关键将是在海上。发展海军无疑增加了雅典政治中民主的力量，同时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当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有了再次说服雅典人撤离城市的依据，最后真的以海上力量取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

地米斯托克利渴望荣誉，喜欢盛大的场面和富丽堂皇，但是，在需要妥协的时候他也还是能够妥协，甚至不惜顾全大局、接受斯巴达人来统领希腊海军。在这危急关头，地米斯托克利能够与昔日的政敌阿里斯提德和衷共济。地米斯托克利非常勇敢甚至冒险，善于抓住战机，同时也富于谋略，甚至很会使用诡计来迷惑和误导敌人。他可能不是特别雄辩的理性说服者和演说家，但他善于运用奇迹和神谕的力量来影响民众和士兵。当胜利使地米斯托克利得到了巨大的荣誉之后，有一个小城邦塞瑞法斯的人说他如此享誉是因为他靠有伟大的城市，地米斯托克利说：“是的。如果我是一位塞瑞法斯人，当然不会出名；但即便你是一位雅典人，你还是会默默无闻。”这倒是颇为准确地揭示了个人荣誉和城邦乃至英雄和时势的关系。但地米斯托克利最后还是被雅典人用陶片法放逐国外。地米斯托克利后来在波斯得到礼遇，但据说当波斯国王要征召他去对抗希腊人时，他自杀了。不管怎样，我们在几乎所有性格和才能迥异的卓越人物那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可能还是对城邦的热爱。这和他们心目中的希腊和蛮族之分也是分不开的。

伯里克利出身于可以说是雅典的一个最显贵和有大量产业的家族。他的母亲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父亲是希波战争的功臣，曾遭放逐。他受教于第一个给雅典带来哲学的外邦人阿拉克萨哥拉和一位音乐家戴蒙。但伯里克利在家世、财富、教养、才能方面的优势在民主政治下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劣势，一旦张扬甚至显露就可能招致放逐。所以，伯里克利相当谨慎，也非常大度。他可能在暗中支持了埃菲阿尔特剥夺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行动，将这些权力分配给了公民大会及其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他自己第一个公开的政治行动是控告代表贵族派的将军客蒙，得到高阶人士的普遍支持。因为客蒙当时权势最大，所以，尽管伯里克利的优势也在贵族一边，他的天性也是不喜取悦民众，但他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有望在日后的政治上跃居首位。据说伯里克利的财富也还不如客蒙，客蒙大量散财也颇能得到民众的欢心。于是有人建议伯里克利用城邦的财富来接济民众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伯里克利提出并实行了给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人发放津贴的政策，这样使穷人也能积极参与政治。公民大会大概就在他的时期完全享有了最高权力。伯里克利还让舰艇上的水兵得到军饷。

伯里克利的权力主要是通过文、武两个途径：即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在议事会发挥影响和连任 15 届将军取得和保持的。伯里克利是雄辩的演说家，但并不愿意频繁地演说以招致人民的恶感，而是更多地通过朋友来发挥作用；伯里克利作为将军可能并没有最高的军事天才，打仗比较保守和谨慎，但他善于用人或者说“将将”。伯里克利也通过兴建如帕特农神庙等辉煌建筑提升了雅典人民的自豪，而大兴土木的公共工程能给许多人带来机会和好处。他发展了戏剧表演，甚至给予观剧津贴来使人们娱乐。在伯里克利治下的时候，雅典城邦最像一个“大政府”。他也懂得妥协，以城邦为重，在发生战事的时候提出让流亡在外期限未滿的客蒙回国。在客蒙去世之后，伯里克利的贵族派对手主要是米勒西阿之子修昔底德。但后者也不敌他而被放逐。伯里克利后来对民众也不只是取悦、宽容和顺从，而是注意引导他们，说服他们看到更加长远和整体的利益。普鲁塔克评论说，“伯里克利能够获得极其卓越的成就，并非仅仅靠高超的演说才华，而是如同修昔底德所说，在于一生的声望和名誉，那是品德所建立的信心，廉洁所创造的认同，以及视金钱如粪土的态度”^①。

我们可以再考察一下这些人物和卓越的关系以及卓越本来的性质。梭伦出身高贵，资产中等，看来并不特别地追求政治上的卓越，这也许是因为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比如说写作优美的抒情诗，喜欢游

^①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1 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9：301。

历和知识的活动。开始的时候梭伦是抱着勉强的态度来对待请他处理政务的呼声,结果还是被选为执政官,并被授予超越于全体官员、战神山议会和公民大会的全权来解决纷争和制定法律。梭伦被授予如此的全权,一定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名声。作为希腊的“七贤”之一,梭伦已经用智慧、公正、诚实和其他方面的才能证明了自己的卓越,他就像是柏拉图《理想国》中那种不愿从政的好人,但出于对自己所生活的城邦的责任感和对穷人的同情心才毅然出来从政。当然,如果梭伦就是执意放弃,也终将受一种激烈冲突和衰败政治的损害。梭伦力求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保持适度和中道,虽然总的倾向还是有利于穷人。中道政策的最初反应往往是双方都不满意的,但虽然梭伦温和低调,却也性格坚定,刚柔并用,下定决心就会贯彻到底。他一旦完成任务也就不再在权力上恋栈,拒绝执掌最高权力,告别雅典达10年之久。

我们可再以阿尔克迈翁家族为例。这是一个在雅典从公元前7世纪到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推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家族,同时也可以说是雅典最显赫、历史记载最连贯的贵族家族。它的政治谱系与时间对应大致是:

公元前7世纪

公元前6世纪

公元前5世纪

老墨伽克勒斯——阿尔克迈翁——小墨伽克勒斯——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亚西比德

公元前620年左右,库隆试图夺取卫城做僭主,阿氏家族的老墨伽克勒斯时任执政官,挫败了这一夺权。但是,老墨伽克勒斯在答应已经逃到雅典娜神坛下的库隆同党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之后,却又杀死了他们,结果这个家族被判犯有渎神罪,被驱逐出境。但其子阿尔克迈翁后来在公元前6世纪的90年代又重新取得了老墨伽克勒斯在雅典的地位,并率领一支分遣舰队取胜。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阿尔克迈翁怎样从吕底亚国王的金库中拿取尽量多的黄金的故事,但这可能只是传闻。阿尔克迈翁的儿子是与僭主庇西特拉图争斗又合作的小墨伽克勒斯,小墨伽克勒斯娶了西锡安的僭主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里斯特为妻,其子则是大名鼎鼎的民主改革者克里斯提尼。而最为持久的民主领袖伯里克利又娶克里斯提尼的侄女为妻。亚西比德的母系也是来自这个家族。

我们这里可以举希罗多德《历史》第6卷中记载的一件轶事来说明阿氏家族的特点。西锡安的僭主老克里斯提尼想把自己的女儿阿伽里斯特嫁给他在希腊所能物色到的一个最优秀的人物,于是公开招婿,希腊各地众多对自身能力和出身门第都十分有信心的人们便来求婚。老克里斯提尼首先仔细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然后在一年里把这些人留在自己的身边,观察他们的德行、气质、教养和日常的行为,既和个别人、也和他们全体交往。结果在求婚者当中最使他中意的是从雅典来的两个人,一个是阿尔克迈翁的儿子小墨伽克勒斯,另一个是雅典当时最富有而且风采也最好的人物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波克里代斯,其实老克里斯提尼更看好后者。但当举行宴会要宣布最后选择谁的那天,老克里斯提尼让求婚者们相互比赛音乐并就某一题目相互进行辩论。当晚宴正酣之际,表现远出其他众人之上的希波克里代斯命令吹笛者给他吹奏,他就开始极其尽兴地跳起舞来;过了一会儿,希波克里代斯还命人搬一个桌子过来,并在桌子上跳了好几种舞蹈,最后又把头顶在桌子上,用两腿朝天表演各种花样。这时,已经产生疑虑的老克里斯提尼再也不能保持缄默而喊道:“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啊,你跳得好,但连你的婚事都跳跑了。”而希波克里代斯则回答说:“希波克里代斯根本不在乎!”

小墨伽克勒斯和希波克里代斯可以说都体现了雅典人的某些特征,但却又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希波克里代斯的才能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在关键的时候没有节制,当然他也不在乎。希波克里代斯尽兴、潇洒、奔放,更多地具有一个艺术家的气质,而小墨伽克勒斯显然更像一个政治家族出来的人,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才能,但能够持重、节制、思考。这一政治联姻对这个家族和雅典都非常重要,提桑德洛斯家族后来几不再听说,而后一个家族则大名鼎鼎,对雅典民主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都是出自这一联姻的显贵家族:有与他的僭主外祖父同名的、正式建立所有公民权利平等(isonomia)的民主改革家小克里斯提尼,还有将雅典民主发展到鼎盛的伯里克利。才华横溢却缺乏操守的亚西比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也有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对雅典的战败和衰落负有某种重要责任。这样一个优越家族的历史几

乎可以说是贯彻了雅典民主兴衰的始终。

站在民主一边的贵族似乎是反对这个阶层自身,但这并不影响贵族个人仍旧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成为民主政治中的卓越者和主导者。作为贵族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实际上本身就经历了首次筛选。没有突出的才能、优点或贡献,他们不可能成为或跻身于贵族;然后就是传承——先天与后天的传承和训练,但这种传承可能是两面的:并不总是更优,也很可能变差。这时他们就可能要被人取代了。强力压制取代反而有可能酿成造反或革命。前者是新贵族取代旧贵族;后者是民主或僭主取代贵族政制。假如有的家族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又连续出了几个富有政治才华和德性的人的话,往往就能够长期地影响和主导政治。

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投身和引导民主,使民众与贵族和僭主的斗争不那么激烈和动荡,使人们的生命财产不致造成很大的损失,从而也对民主事业不致构成大的伤害。雅典民主进程中有限的流血斗争大致如下:梭伦改革前夕和中间矛盾紧张,但似乎不见有大规模暴力冲突的记载;庇西特拉图夺取政权虽然使用了诡计,收缴了他人武器,但他夺取卫城的保镖使用的只是木棒。杀死僭主希庇阿斯之弟而被处死的两个同性恋青年,后来被誉为推翻僭主、争取自由的英雄,但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他们的刺杀动机看来主要是与希庇阿斯另一个同父异母之弟的情感纠缠,遭到侮辱而引起的个人复仇。当然,激烈行为往往会导致另一方同样的激烈行为^①。暗杀发生之后,此前已经统治了10多年、此时感到自身不安全的希庇阿斯开始了镇压措施,最后导致反抗的一方引入斯巴达人干预。当驱逐了僭主的斯巴达人开始倾向支持贵族的一方,克里斯提尼则因为站到了人民的一边,动员了人民的力量而取胜。此后的100余年,雅典虽然外战频繁,但内乱几乎没有,有个别的暗杀,但是否是政治暗杀不得而知。只是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末期和刚刚结束的危急时刻,雅典内部围绕着是恢复“祖先政制”的少数统治还是继续保持全体公民决策的民主,才出现了激烈的内部流血冲突和镇压。雅典民主的过程虽然可能因此比较缓进,但由于基础稳固,在经历了残酷的多年战争且失败之后,雅典的民主还在公元前4世纪相当活跃地维系了近百年。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却达到了非常彻底的民主,这也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最有可能反对民主的力量——贵族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人站到了民主一边,并且是由他们来领导民众。另外,这一比较和平的过程也和雅典民主进程的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一民主的进程中,在人们的心中,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并没有一个预先的彻底民主的理想蓝图,甚至没有专门的民主理论。在此,没有高调理论的先行,只有长期经验的累积。雅典人只是像汤因比所说,面对社会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们亟须解决,面对现实的挑战他们亟须回应。在这回应中,对自由的热爱,对伟大城邦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追求卓越的抱负,对民众的同情心,对平等自由的正义感,既斗争又妥协的策略,既坚持自己一方的利益又不破裂城邦的基本共识,还有普遍的对法律的尊重等等^②,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幸运的是,在所有这些问题和动机的交织中,雅典人取得了一种恰当与适度的平衡,从而造成了雅典的辉煌。

在雅典的民主进程中,民众与政治精英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政治家在其中扮演了主角,起了主导的作用。而民众则可以说是起了一种基础的作用,甚至是起了一种主力的作用。他们通过持续的压力,有时甚至是用坚决的反抗或抵制来表明自己的力量。尽管他们不可能留下自己的名姓,但他们所起的作用看来仍然不是主导的作用,即不是设计和建立制度的方向性作用。群众更不可能是舞台上的主角,主角总只可能是少数人,甚至很少数,乃至有时只有一个,结果这整个时期或时代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当然有功劳或罪过都归于一人的“简化”,不会是完全真实的。民众与政

① 正是因此,这也能够成为有意将事件进程引入激烈的人的一个策略,当然在这个例子中不是这种情况。

② 甚至有人提出,保证了雅典繁荣的政制更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SEALEY R. The Athenian Republic: Democracy or the Rule of Law?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1, 146-148. 作者认为,雅典人所关心、追求以及所达到的主要政治成就是法治而非民主,如果需要有一个口号的话,甚至可以说雅典是一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在我看来,法治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但这种观点大概还是不能推翻雅典政治中民主要素更胜于法治的主流意见,正如在梭伦立法中,即便是独立的民众法庭,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指向使民众成为政治人物的最后选择和评判者。

治精英合力创造了历史,但少数人还是起了关键的制度设计和建设性作用。变革的方向,变革最后呈现什么面貌,尤其是落实为什么样的制度,和起领导作用的精英看起来更有关系。

但我们宁愿说这一民主进程是客观的“演进”而非主观的“推进”,因为领导者们的动机目标并不全然都是要推进民主,而且,尽管作为卓越者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远见卓识,但他们也并不全然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全部意义或长远结果。其实他们最直接的动机可能就是追求个人在政治上的卓越和成功,或者为了解决城邦当前的紧迫问题。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城邦的热爱,捍卫和促进公益的正义感和对弱势者的同情。作为平民领袖,在雅典民主兴起前后两端的梭伦与伯里克利相对来说应该是最智慧和公正的了。但是,梭伦不做僭主,固然有为了城邦的考虑,也未曾没有个人的考虑:对他来说,僭主的地位易进难退。梭伦立法主观上的动机与其说是追求民主,不如说是追求中道。而伯里克利选择站在民众一边也是有他与政敌竞争的考虑,虽然这些都是不可以苛责于前人的。

当我们说政治精英起了一种主导的作用,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民主的主因。在因果的链条中还有各种时段的各种不同环节,还有一系列的偶然性。但是,在这些偶然性后面,的确有长期的变化趋势和力量在起作用,例如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变迁,尤其是后者,在一个最后还是以力取胜、战争频繁的时代,军事力量的主体是那些对政治影响很大的人。对雅典人来说,战场的决定因素渐渐从最早人数较少的骑士到人数较多的重装士兵,再转移到众多的海军水兵,这也推动了从贵族到有限民主再到彻底民主的变化。当然还有雅典乃至希腊人比较普遍的热爱自由的传统。再追溯下去,则和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依托山地,面向海洋,整年温暖的气候适合户外集会等等。

四、平等自由与卓越

那么雅典人对民主政制的追求后面的主要价值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来分析雅典人的这种价值追求,他的演说可以说是雅典所取得的成就和雅典人特性的一个概括。

在演说中,伯里克利谈得最多的优秀德性还是勇敢。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在战争时期,而且他是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发表演说。但他也反复谈到了自由、自由城邦,这是更为根本的。他同时说明了自由与勇敢、幸福的关系:“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人们一般都说追求幸福,但在希腊人那里,自由是幸福的核心要素,勇敢是争取和保卫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毫无疑问,这种自由必须是平等的,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的自由。所以,伯里克利会强调,雅典人的先辈传承给后人的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所有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伯里克利在演说中没有谈到自己,也没有具体谈到以前的卓越者的贡献^①。在我看来,在雅典民主的进程中,实际上有两种主要的价值追求,一种是比较显性的对平等的政治自由的追求;一种是比较隐性的对个人卓越的追求。后一种其实更早就比较持久地存在,前一种则在民主进程中逐步加强。雅典人将追求卓越与追求平等这两方面的外在成果都发展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前者的表现是包括政治、艺术、文学的最广义的文化杰作;后者的表现是一种彻底的民主制度。

这两种价值追求本来是冲突的,比如在现代社会,对卓越的追求甚至完全被对平等的追求所淹没而“失声”。当然,一种对优秀和卓越的追求即便在舆论上不显,也还是会始终存在。另外,一种彻底平等的政治自由也可能对其他方面的自由(如像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可能更为看重的良心自由、信仰自由)构成限制,也会对一些卓越者、领导者的政治自由和权力构成限制乃至打压。

前此我们主要是注意卓越与民主的正相关关系,即卓越促进民主、民主容有卓越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卓越误导民主,民主压制卓越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其实一直

^①色诺芬倒在其《回忆苏格拉底》卷三第五章谈道:“一座著名城市的整个从前的历史似乎就是一种对追求卓越的最强有力的激励。”这个地方就是雅典。转引自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8。

存在着某种紧张。一些巩固民主的措施固然能够加强民主,防范僭政,但也可能压制卓越人士,乃至对有巨大贡献和功劳的人不公平。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著名政治领袖多命运不佳,比如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功臣米提阿德被监禁,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功臣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还有这次战争中的另一功臣阿里斯提德也被放逐,其中有人投票放逐他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老听到他很正直。伯里克利算是幸运的了,他本人只是被罚款,但他的老师还是一个被迫害,一个被放逐;密亚提德之子客蒙和修昔底德也都被放逐;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也差点被放逐,直到他们串通并让人们投票放逐了另外一个没有多少名声、并非真正卓越的人,此后雅典人对陶片放逐法就意味索然了。因为陶片放逐法还有一个被放逐者是否配得上的问题,按其本意,只有真正的“卓越人士”,可能对城邦构成威胁的人才够资格被放逐。当然,这一放逐法也有助于预防卓越人士与民众的激烈冲突,它能够舒解民众的负面情绪,甚至对卓越人士也算是一种保护;它并不没收被放逐者的财产,开始是放逐10年,后来改成5年就可返回雅典,有时还可提前征召回来。

所以,总体看来,在古代雅典,这两种价值追求还是基本维持了一种不仅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甚至还互相促进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还是会有紧张和冲突,甚至可以说当发展到某一阶段,这种紧张会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在雅典民主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正是政治卓越引领了平等自由,同时平等自由也保留甚至支持了对政治和文化卓越的追求。

希腊人是追求卓越的,不仅是其中的少数人,甚至从整个民族的特性来说,他们也是比其他民族更为追求卓越的,并追求实现卓越的一个基本条件——自由。多数人也是会追求卓越的,但是,多数人却实现不了这种价值,因为卓越的含义就是高出于多数人,高出于众人才显示出卓越,但至少这是多数人看重和欣赏的卓越,这就为卓越提供了深厚土壤,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这种价值,而他们——至少其中政治上的最卓越者恰恰是面向大众和服务大众来追求这种卓越的。

从卓越者方面来说,形势使得他们只有站在人民的一边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能实现自己的卓越。还有竞争者,但雅典的竞争不是政党的竞争,而是个人的竞争。小城邦也使阴谋和秘密的组织活动很难得逞,而且他们可以通过公开的竞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民众这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雅典民众的限制,雅典才没有出现凶恶的僭主,没有出现少数冥顽的贵族或骄横的富人统治。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政治判断还是比较健全的,何况雅典人还是一个富有政治意识和长期政治训练的民族,包括基层民主和地方自治的训练,比如雅典很早就开始有了地方村社的管理、民众法庭以及百多年渐进到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这些政治活动是通过每个公民都必须参与的抽签决定的,是一种政治权利,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义务。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真正卓越的政治领袖,雅典的民主才走向了一个健康的方向。不仅君主需要驯化,民主也需要驯化。

但即便发展到了公民政治权利非常平等的时期,对政治权利的实际行使也还是会不完全平等的。政治的最后决定权可以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但少数人的日常治理常常就是政治的真相。不仅公民在雅典(包括外邦人、奴隶和妇女)的居民人口中只能说是少数,参加每次公民大会的人相对于全体公民来说也是少数;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人相对于公民大会的参与者来说也是少数,而真正起重要作用、发挥积极政治能量的人更是少数^①。当然,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如果要发挥更为积极的政治作用,并没有什么外在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的限制,如果说有限制的话,那就只有个人能力和主观意愿的限制了。另外,虽然还可以通过抽签担任一段时期内的公职,但即便是担任同样的职务,各人也还是会

^①公元前4世纪在雅典的这个数量比大致是:所有居住人口大概20多万——公民大致3万以上——每次公民大会参加者6000人——经常发言的公民大概近百人——而在演说者或议会中真正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也许只有数十人。参见汉森·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与意识形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6-126,468-470,472。他写道:“在任何时候雅典的政治都被大约20名演说家(取其政治含义)外加几十名追随者所主导。”汉森·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与意识形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94。

因为能力和意愿的差距造成实际的不平等,事实上还是少数人在其中发挥着相对重要的政治作用。在一些重大的转折关头就更是如此。在每个迅速崛起的地方和处理危机的时刻,我们几乎总是能看到一个或几个卓越者的巨大身影。

当然,如前所述,如果在民族之间进行比较,可以说雅典人乃至希腊民族本身就是相当追求优秀和卓越的,他们即便知道不可能人人都达到卓越,但也是非常能够欣赏他人的卓越和个人在某些方面的突出和卓异。他们在政治上要求甚高,但在经济上要求甚低;在艺术上相当敏感,即便不能创作也能欣赏。这些都有助于协调平等与卓越这两种价值追求。

促成这两种价值协调的还有普遍的希腊精神:不走极端,强调平衡适度与中道,这也是梭伦从一开始就奠定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基调。另外还有普遍的尊重法律、重视立法乃至尊重传统规则。在雅典没有多少内部的街头骚乱,没有群众运动,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在公民大会等会议上解决,立法改革代替了暴力革命。一旦立法,也就被相当普遍地尊重和遵守,如果需要改变,还可通过公民大会和立法来解决。

还有最后、但绝非最次要的一点就是,雅典人不像现代人那样重视物质,重视财富,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较简单,不太以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为意。不仅卓越者如是,普通公民也是如此,卓越者常常散财,慷慨大度是普遍被尊崇的德性。民众也没有表现出对财富和富人强烈的不满和忌妒,他们重视和珍爱的是切实保障公民政治的平等权利而非不断扩大经济的平等福利。

Evolution of Democracy in Excellence:

A Kind of Axiological Thinking about Democracy in Ancient Athens(I)

HE Huaiho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Evolution of democracy in excellence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Athens. Dur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or about 200 years, the political elite questing for excellence and the common people questing for freedom joi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Athens. However, we argue that democracy in Athens is a product of natural evolution rather than the subjective motives, because there was no theoretical guide and the wise Athens people just conformed to the inevitable la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eliminating the aristocracy and tyrant politics in Athens. As it should be, excellence and democracy can promote each other as well as tension with each other. While in the long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Athens, excellence and democracy can coordinate in development, the credit belonged to the spirit of middle mean and the view of happiness which valued virtue while undervalue material in Greek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 city-states of ancient Greece; Athens democracy; value; excellence; equality

●收稿日期:2017-06-06

●作者地址: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涂文迁